

##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生

祁琦 刘舸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中国文学”这个如今我们熟悉和常用的概念,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其产生和使用却经历了一番因中西文化内涵差异而造成的曲折和困难。梁启超作为那个时代的舆论旗手和改革宣传者,为了宣传政治思想、激发民气,借鉴日本明治时期的学说和经验,极力提倡新式小说对于普通民众和社会的积极意义。而“中国文学”的概念就在这个新式小说地位提升的过程中,在“小说”和“文学”概念的交互使用和联系中,顺势产生了。

**关键词:**梁启超 明治日本 中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 I      **文献标识码:** A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来自于西方各个方面的冲击,所谓“西学东渐”,一些如今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名词或概念在当时则是在反复地使用和调适中才逐渐确定了它的含义。在这个由西方到东方的文化传输过程中,日本因其明治维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所以往往很多西方的东西加了日本的烙印后再传至中国,并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则因其特殊的质性而成为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传输者。如今我们常用的“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正是梁启超在这个受日本影响的宏大传输中首先提出、使用的。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对“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生进行历史考察,“考其实以证其名”,对于文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一、逃亡日本前梁启超的“文学”观念

关于“中国文学”概念梁启超的确切使用时间,日本学者斋藤希史提出是在《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由梁启超撰名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长篇广告上。另外吴泽泉提出是在《新民丛报》1902年第4号开始刊载的《饮冰室诗话》中,但并未说准确期号。笔者查阅史料发现,“中国文学”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使用是在《新民丛报》1902年第9号“文苑”栏目所载《饮冰室诗话》中。但1902年之时,梁启超已离开中国三年多,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要了解梁启超的思想是如何受日本影响、受了哪些影响而传输中国的就必须考察梁启超在1898年逃亡日本前其思想之大概,明白任公思想嬗变的源流。

从1890年受学于康有为到1898年这八年间,梁启超的思想变化笔者认为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师事康有为时期(约1890—1895)。康有为的学说使梁启超逐渐与“旧学”分道扬镳,并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知识。但此时梁启超的思想体系还相当简单、浅薄。除了康有为的讲说以外,梁启超获取新式知识的途径主要来自“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这些书的主要内容是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医

学与农学、工艺技术、军事科学、科技人物传记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出180种西方各类书籍中，社会科学类译书仅21种。因此梁启超对于“时务”的认识在此阶段仍关注于铁路、电线。及至甲午战争爆发，方法上仍然是“求天下之人才”，在“公车上书”时所提“变法”亦无实际内容。有所不同的是“以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第一义”，强学会与《中外纪闻》的开办逐渐掀起了私人开学堂、办报刊、译西书的风气。知识分子了解新式知识、讨论国家事务的途径变多，风气和言论进而越发地开放起来。但观其言论，还是如以前士绅之间相互奔走、引援的情状，所欲开之“风气”仍然还是停留在士绅阶层。

第二阶段是同志相互激励期（约1896—1898）。同志之间经常相互讨论学问，思想开始自主，对于康有为的学说开始有了不同意见，并逐渐确立了自己逃亡日本以前的思想体系。但刚开始思想还不甚开阔，记其情形言：

复生自惠其新学之诗……所谓新诗者，颇喜捋撻新名词以自表异……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吾党当时盛言春秋三世义……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

1896年梁启超结识了黄遵宪，并与汪康年一同在上海开办了《时务报》。先后写成《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文。这是梁启超初期个人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体现了其对于西方文化知识的认知水平。以《变法通议》为例，刊载两年多，共14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思想前进脉络（最后两篇在日本作成）。以内容谓，梁启超总结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认为以前洋务学堂创办多年而无可用人材是因为“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所以要想实行新政，还是从新式学校开始，进而改变知识体系、改变制度。因此他还认识到，人才之不足是因为以前文化知识仅存在于士绅阶层。文化知识应当普及于四万万之民众，进行平民教育，如此则人才不乏。就特点而言，几乎每篇皆言及欧美和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国内开明官僚士大夫都开始逐渐有了一种学习日本的共识。梁启超开办大同译书局，主张翻译日本书籍，认为借助日文书以介绍西法可以事半功倍，应以日本作为学习西方的中介图中国之自强。

在这八年时间里，梁启超虽然得风气之先，但著述上仍以借古文经典杂用新词新物以发挥。观其所辑《西学书目表》，人文社科读物偏少，而声光电物理化学等又能深入几何。此时的梁启超对于国家、民族、国民没有更深的认识。至于文学，他认为西方和日本多靠小说发蒙儿童心智，小说的作用在于“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振厉末俗”。对于小说及其功用还停留在较为传统的看法上，远未把小说与开民智、兴民权、改国运等政治愿望相联系。

## 二、甲午前后日本文学的概况与梁启超的选择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由日本人协助，乘坐军舰逃亡至日本。在军舰上梁启超读到

一本日本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1885），梁启超随阅随译，后来便把中文版刊载在了《清议报》上。此时《佳人之奇遇》已成书13年之久。在那个政治小说还没盛行的明治初年，日本的文学观念同中国类似，认为小说难登大雅之堂，认为旧小说“其主旨所在，大略非忠孝节义之事则优胜劣败之战纪，非缱绻之恋情则因果报应之理，非侠客力士之事则盗贼博徒之事，非怪说鬼谈则滑稽谐谑”。但在后来不断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其中《花柳春话》的翻译还为日本小说界输入了“政治小说”这一概念。从此很多的西方小说在翻译到日本后多被冠以政治小说的名目，这是与当时日本日渐兴盛的自由民权运动相联系的。宣扬自由民权者看到西方政治思想借由政治小说而宣扬，从而认为小说可以“矫正时弊，芟除陋习，培养自由之种子”。为了扩大小说的影响，译者还特意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宣传“古今欧美诸国之小说家，往往为学者社会中杰出超群之有名大家”。

在这股政治小说热潮之后，日本的政治和思想界也的确迎来了不一样的转变。1889和1890年《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的先后颁布，代表着天皇绝对主义体制的确立，同时也说明了明治初年自由民权运动的失败，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以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宣扬的“国粹主义”认为日本因为过度的欧化主义使日本社会道德沦丧，因而强调民族自尊。宣扬日本和大和民族有着相当的优秀性，提醒人们不要盲目崇拜外国人。在保存“国粹”的同时依然以一种进取的姿态，保存自身特质的前提下，适应世界大势的变化。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高山樗牛继承了“国粹主义”而提出了一个以“国家至上主义”和“绝对主义”为内涵的以日本自我为中心的“日本主义”。与此同时，民众的国家意识变得更为高涨起来，很多日本知识分子也开始向右倾斜，朝野共同创造了“文明与野蛮之战”的意识形态。

来到日本后，梁启超“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谓己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而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梁启超的思想自然首先受到了他的影响。此时的梁启超到日本不久，仍然以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作为其阐发的基础，然后结合福泽谕吉的文明阶段理论说到：

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级曰野蛮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生，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其轨度与事实，有确然不可假借者。

这是梁启超新旧思维交替的体现。不过与“公羊三世说”不同的是福泽谕吉的文明阶段理论隐含着对西洋文明的自卑感和对亚洲国家的歧视，是一种借由进化论而阐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者自然就要压制落后者，而落后者自然要被先进者所压制”。这种衍生于日本民族性的具有强烈自尊感的“脱亚入欧”认知，一直为日本官方和众多学者所认同和追随。到了甲午战争以后，这种强烈的自尊感和“富国强

兵”的举措得以满足和证明，一转而成为国家主义泛滥的依托。战胜中国代表着日本已经脱离了衰败旧帝国的行列，已经与这个大洲上其他落后的国家分隔清楚，不再忍受不平等的条约和关税，也具有着和欧美列强一样的施之于其他落后国家的特权。但不久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又让日本幡然醒悟，认为自己仍然没有跻身强国之列。继而卧薪尝胆以俄国为假想敌，再次趋附未完成的“文明与野蛮之战”。

国家主义充盈日本之时正是梁启超徜徉于新知之日。感于这种激亢的尚武精神，他反思认为中国所缺正是这种国家主义，并在《清议报》发表自己的见解：

客难任公曰：子非祖述春秋无义战，墨子非攻之学者乎？今日言，何其不类也。任公曰：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理想之时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谓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辞也。

换言之，梁启超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其有着令人敬佩的“大和魂（武士道）”。而中国如今最为现实的需求就是要寻找“中国魂”，也就是要宣扬国家主义以免受列强的侵略。之后梁启超通过高田早苗、加藤弘之等接受了美国学者灵绥（P.S Reinsch）和欧洲学者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的部分学说，认为“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时代，二十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小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小说对于日本的作用，梁启超早在1897年时就曾认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如今日本已跻身“民族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其在之前“民族主义”时代所风靡的政治小说，正是此时准备构建“民族主义”的中国所急需的。因此梁启超通过国家主义学说，将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对号入座，选择了“十九世纪”的日本以借鉴，找到了改变中国现状的方法——新民。要如何构建“民族主义”、如何“新民”，梁启超认为“新小说”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 三、梁启超的吸收与发明

“小”、“说”两字合并为汉语双音节词早在春秋战国之时作为“九流十家”之一的“小说家”而被使用，并记录于传统的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中。拥有深厚传统学术功底的梁启超自是再熟悉不过。虽然含义不尽相同，但梁启超皆几乎没有障碍的开始使用

“小说”或者“说部书”等词语。与“小说”概念相对稳定的情况不一样的是，梁启超对于“文学”这一概念的内含和外延则经历了相对较长的认识和调适。古代汉语当中并非没有“文学”这一双音节词，但不像“小说”一词与西方相关词语相类似、相联系。这种中西文化内涵的差异是导致“文学”一词认识和使用困难的关键。在“西学东渐”的近代潮流当中，与仍然受到深刻汉文化影响的明治初年的日本知识分子相似，梁启超同样也是通过对小说等非儒家学说内容的抬高，使其独立于传统学术的范畴，最终得以确定“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

早在戊戌之前，康有为即编辑了《日本书目志》（1897）一书，梁启超亦曾撰《读〈日本书目志〉后》言：“南海先生之志，则启超愿鼓歌而道之。”所以这本书是可以体现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有关于“文学”的观念的。此书共分为十五种门类，其中有“文学门”、“文字语言门”和“小说门”。以西方之“文学”概念言之，当中“小说”不从属于“文学”，“文字语言门”又有若干文学的内容，“文学门”下又有非文学之内容。可以看出当时梁启超关于“文学”的概念是模糊的。同样，梁启超刚到日本之时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中引康有为之言：

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人多……今中国识字之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

这段话把国外小说作者称之为“魁儒硕学”，区别于以往“海盗海淫”之“中土小说”，有意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很明显这段话中梁启超把“小说”和“文学”区分开来，此时的梁启超仍然使用着“文学”一词的旧义，即文章经典、儒家学说之类，并把“小说”独立于儒家学说之外。不过“每日阅读日本报纸”的梁启超很快有了变化。一年之后，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介绍日本小说对于明治维新的作用时说到：

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如柴东海之《佳人奇遇》，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矢野氏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等。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

此时梁启超依旧宣扬著述小说之人并非街头巷尾之俗人，乃是“一时之大政论家”，其意图仍然是为了提高小说的地位。不过把政治小说著者归类于“文学界之泰斗”，显然是已经认为小说属于文学的一种，是文学的外延之一。如果说这段话的字面上“小说”与“文学”的关系显得不够紧密，那么在之后《新民丛报》上赞扬“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则明白无误的说明小说属于文学的外延，是文学中的一种门类。此时的“文学”一词已不同于当初

的“文章经典”和“儒家学说”。如前文所述，几乎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开始使用“中国文学”一词，此后“中国文学”一词逐渐为世人所用。

#### 四、结语

“西学东渐”的大潮让多少世人卷入其中，梁启超身为“舆论界之骄子”经戊戌之变，东渡日本，以其“常带情感”之笔锋，又掀起另一阵风潮。来到日本的梁启超面对铺天盖地的新知识，更发挥其舆论旗手的特长，他如同文化输送管道中的阀门，他对西方文化进行过滤、改造、发明，然后以其最大之能力输送于中国。曾经的“日本文学”是沿着明治维新——宣扬民权——提倡小说——日本文学，这样一条道路而形成的，最终恰好出现在了梁启超面前。而梁启超恰好也循着戊戌维新——改善民气——提倡小说的道路遇着了它，最终提出了“中国文学”。这当中我们应当看见其主线，即主要是政治上愿望推动了小说的改良和观念的革新。梁启超在不断学习吸收西方和日本政治思想学说的过程中，由崇尚卢梭等人的自由民权思想到后来推崇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而他提倡政治小说的言论也正是处于这个过程当中。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在其心中占有一定地位。同时在此前后的甲午战争和庚子之乱等一连串国家厄运，给梁启超以不小影响。他急需找到一种可以证明中国文化内涵和改变中国现状的东西，以证明中国的未来仍有希望。

#### 参考文献

- [1] 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 [2] 狭间植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 [3]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 [4]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5]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 [6] 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
- [7]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选自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
- [8]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续），选自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
- [9] 夏晓红：《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
- [10] 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 [11] 吴泽泉：《错位与困境：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考古学报告》，《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 [12] 赵强：《“中国文学”发现自身的方式》，《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

[ 13 ] 郑焕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概念的现代发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

## Liang Qichao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Qi Qi Liu G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we are familiar with and commonly use nowadays, in the modern wave of "Western learning is moving toward the east", its production and use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twists and turns caused by differences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notations. Liang Qichao, as a public opinion bearer and reform advocate of the era, used the teaching and experience of the Meiji period in Japan to publicize political ideas and stimulate the public's morality. He vigorously advocated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new fictions for ordinary people and society. The conc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omotion of this new style of novel, in the interactive use and connection of the concepts of "fiction" and "literary".

**Keywords:** Liang Qichao, Meiji Japan, Chinese Literature

**作者简介:** 祁琦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生。

刘舸,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副院长。